

《清明》与新时期安徽文学^{*1}

姚宁

(合肥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合肥 230009)

【摘要】: 大体而言, 文学期刊《清明》在新时期安徽文学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三种基本角色, 即作家扶植、文学生产导引和文学评价。这三重角色使得它在新时期安徽文学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并由此而促进了新时期安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关键词】: 《清明》; 文学期刊; 新时期安徽文学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3634(2018)02-0035-04

文学双月刊《清明》由安徽省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办, 创刊于 1979 年, 是“文革”后最早创刊的文学期刊之一。1979 年出版了两期试刊后, 1980 年至 1983 年每年刊发 4 期, 随后步入正轨, 1984 年正式改版为双月刊, 发展至今已经有将近 40 年的历程。作为安徽省内最权威的大型文学双月刊, 《清明》的办刊实力、地位及影响, 都是省内其他文学刊物难以追及的。由于其所处的重要位置, 《清明》在新时期安徽文学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作用。

一、扶植:《清明》与新时期安徽作家的成长

文学期刊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其对文学创作主体——作家的扶植与培养上面。如今, 足以代表新时期安徽文学成就的是一批中青年作家, “其中较早的佼佼者有潘军、王英琦、熊尚志、梁小斌等, 随后又陆续涌现了陈所巨、季宇、许辉、许春樵、潘小平、梁如云、陈源斌、李平易、钱玉亮、严歌平、蒋维扬、沈天鸿等新秀。他们不仅壮大了安徽当代文学的队伍, 而且以内容深厚、风格迥异、手法新颖、文采斐然的众多作品, 为安徽当代文学增添了可贵的财富。”^[1] 这些作家中的相当一部分都与《清明》有着紧密的联系。《清明》或是他们创作的起跑线, 或是他们由本省走向全国的平台。作为新时期安徽文学的鼎力支持者参与者, 《清明》忠实地记录下了安徽作家成长与发展的轨迹。

作家潘军的代表作《日晕》就首发于《清明》。至今, 潘军对当年作品的刊发依然记忆犹新, 他说: “1988 年, 第三期《清明》在经过风雨后终于以崭新的面貌问世了。《日晕》很快在省内外产生影响, 有不少报刊发表了这部作品的评介文章。……没有这份杂志对《日晕》的特别操作, 我想这部小说的影响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如今我虽然写过一些东西, 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应该说与十几年前《清明》对《日晕》的深切关怀分不开。这份美好的记忆将一直追随着我。”^[2]

更重要的是, 《清明》还对一批极有潜力的安徽作家长期跟踪扶植, 帮助他们成长为安徽文坛的高产作家和主力军。皖北作家孙志保便是典型的一位。在 1994 年至 2000 年这段时间内, 《清明》较为集中地刊出了孙志保的《黑白道》、《盼望潇洒》、《父亲是座山》、《温柔一刀》, 2000 年第 2 期更是以“孙志保作品小辑”的形式集中刊登中篇《灰色鸟群》和短篇《成林和芳子的爱情故事》以及创作谈《小人物》。紧随其后又刊载了评论文章《探寻人的“生”的意义——皖北作家孙志保论》(黄裳裳, 2001

¹ 收稿日期: 2017-06-12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JS2014AJRW0109)

作者简介: 姚宁(1978-), 女, 安徽蚌埠人, 硕士, 讲师。

年第3期)。这样的频繁露脸,使得孙志保的作品更快地引起文坛关注。几年间,“中篇小说《黑白道》、《父亲是座山》、《葵花朵朵》、《温柔一刀》、《灰色鸟群》先后在《清明》等杂志发表并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黑白道》、《温柔一刀》分获第三、五届安徽文学奖。《温柔一刀》被多家报纸转载,收入《1999年中篇小说精选》(中国作协编)。”^[3]孙志保的作品能够获得这样的关注与成绩,应该说《清明》的大力扶植功不可没。

《清明》同样给予了弱势写作群体以积极的扶植。作家杜子建,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活罪难逃》,作品本身并没有刊发于《清明》,但它的面世和作者人生的改变均得益于《清明》的编辑们。杜子建出生于安徽省贵池市茅坦乡。1990年盛夏的一个黄昏,喝得酩酊大醉的杜子建与人打架,致对方重伤,被判刑6年。出狱后,经几年的努力,数易其稿,杜子建终于完成了近30万字的作品——《活罪难逃》。但可以想象的是,对于一个曾经进过监狱的人,又有多少人会认真对待他的作品?所幸他遇到了时任《清明》杂志主编的段儒东。在完成初稿之后,杜子建背着他的书稿,专程到合肥拜访段主编。段主编连夜读完了这部长篇小说,看后予以极高评价,并特意请编辑部的几位同仁也看一看,然后把杜子建请来,面对面地进行的“会诊”,帮他出主意。此后,杜子建根据各方面意见,对书稿进行了几次较大修改。随后,段儒东更是亲自多方联系出版社,最终促成了长篇小说《活罪难逃》的出版。

纵观《清明》30多年的办刊历程,它一如既往地坚持独立、纯粹的审美价值取向,秉持“以质论文”的办刊原则,大量文学新人经由《清明》而登上文坛,逐渐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同时,这种办刊态度也使得《清明》能够赢得尊重,受到文学界的推崇。

二、导引：《清明》与新时期安徽文学的现实主义风貌

新时期以来,尽管文学创作的外在环境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但在安徽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一直是作家们的核心追求,作品呈现出审美地描摹客观现实的特点。《清明》自创刊起,就尤其关注那些贴近现实生活,反映现实生活,与人民息息相关的作品。作为“文革”后安徽省内最权威的大型文学双月刊,它对新时期安徽文学发展的宏观导向作用,既表现为客观的效果,也表现为期刊的主动追求。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文革’刚刚结束,中国社会面临着百废待举的局面。‘文革’的阴影仍留存在社会大众的心灵中,各种‘左’的思想、人物、机构仍在阻碍社会的进步而改革开放的呼声也愈来愈响亮。在此情形下,文学自然地承担起了其社会功能,成为思想斗争、舆论表达、情感宣泄的工具。于是文学的现实性与社会性成为整个社会共同的要求。因此,整个社会都对具有强烈的社会性、现实性的社会问题小说情有独钟。”^[4]在这种背景下,《清明》编辑部明确提出“要恢复和发展五四以来的战斗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加强和人民的血肉关系,大胆干预生活,歌颂人民群众在四化建设中表现出来的革命理想、科学精神和高尚情操,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鞭挞阻碍社会进步的腐朽的丑恶事物。”^[6]《清明》创刊后的几期连续刊载了安徽作家鲁彦周、石楠、陈登科、江流、曹玉模等作家的作品,都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他们的创作已经显示了安徽文学明晰的现实主义精神。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开始摆脱社会政治功能的束缚,出现了流派纷呈、多元并举的发展势头,尤其是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等概念大张旗鼓、粉墨登场。《清明》并没有盲目跟风,而是坚持现实主义导向。这一时期刊载的作品,只有极个别小说在表现方法上涉足新的技巧。譬如1986年第4期登出的《我的前半生》,作者陈村为了加强阅读上的紧迫感或追求某种特殊阅读效果,有意取消了文中的标点符号,属于带有明显汉语修辞实验性质的先锋小说。除此之外,大部分的安徽中青年作家,“在文学创作中,都致力于对改革开放中的现实生活作真实的描绘。他们的作品,各有其特定的视角,惊奇的审美把握与观察,特定的人物与题旨,但在贴近客观社会生活,传达人民心声上,却是相互沟通的。面对着他们创造的五光十色的生活场景,读者们分明可以感觉到作者对生活的敏锐体验与发掘。”^[6]

90年代之后,文学的“轰动时代”已经过去。此时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市场经济大潮与影视网络等新媒介的多重冲击下,文学被日益放逐到社会的边缘,作为文学传播载体的传统文学期刊陷入更加艰难的生态环境。在整体性困境中,一些

文学期刊纷纷挤进改版大潮,“就改版模式而言,大体有两种类型:一是以放弃文学性为代价迎合大众趣味;二是坚持文学性的前提下,走雅俗共赏的路子。”^[7]面对期刊界“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趋势,《清明》主编段儒东代表编辑部坚定地表示:“现实主义命题虽然古老,但远未走到尽头,它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清明》将坚持现实主义不动摇,坚定地走自己的路。”^[8]90年代初的几年,《清明》陆续发表了《走入枫香地》、《残棋》、《女工》、《扶贫》等一批真实描写中国转型期社会历史进程的佳构杰作,这些作品以贴近生活底色的书写坚守着现实主义的精神园地。

世纪之交,《清明》再一次申明“自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始终是《清明》的一面旗帜。”同时强调“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时代,特别需要一种精神,一种对‘道’的坚守。”^[9]前者是《清明》一以贯之的办刊宗旨,后者恰体现了《清明》对于文学理想的追求和执着。20世纪后的《清明》不断推出有分量的作品,参与到文学精神建构中。以2002年为例,这一年《清明》共刊发中篇小说26篇,题材类型多样,有关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流泪的冻土地》(韩旭东)、《半个月亮爬上来》(文星传);有触摸时代阵痛的反腐小说,肖仁福的《官帽》、孙志保的《干事的日子》、叶向荣的《爆炸》、郭牧华的《制造典型》、李春平的《落红无数》等都以自己的书写方式对“反腐”予以了一定深度的探索。这些作品掷地有声,从不同角度切入社会敏感问题,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2004年第3期的中篇小说专号也颇为引人注目,其刊登的几部小说,如王大进的《禅意》、石钟山《终点》、邱华栋《橘黄色的黄昏》以及许辉的《别人的天堂》更加注重表现生活的复杂性、深广度与多样化,关注人生和现实,多层面地展示当今的社会生活。

通过以上追溯式的分析,我们不难梳理出,《清明》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历任主编均是现实主义的积极倡导者,这使得《清明》一直以贴近现实的鲜明姿态,呈现出清晰的面貌(《清明》从创刊至1991年第4期,主持者署名均为《清明》杂志社编辑部;1988年第3期出现主办人周锋、段儒东的署名;1991年第6期开始由周锋和段儒东分别任常务副主编及副主编。段儒东从1995年第1期起担任独立主编,一直到2002年第6期;2003年第1期起由季宇担任主编直至2015年第1期由舟扬帆接任)。这虽然并不直接决定新时期安徽文学的走向,但作为和新时期安徽文学同步发展的见证者,作为新时期安徽文学传播的重要载体,应该说它在一定层面上深刻影响着新时期安徽文学的总体面貌。当然,这种影响也不全是积极一面的。安徽大学王达敏教授对于新时期安徽文学有着“扬名在前,隐名在后”的总体评价。他认为安徽文学继80年代的创作辉煌期到90年代渐次退到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上,其主要原因在于“安徽作家固守传统现实主义”^[10],而这种“固守”与其文学传播重要载体《清明》近乎狭隘的“现实主义”标举有着一定的导引关系。自创刊起《清明》就非常注重作品的主题选择,而较少关注写作的技法层面,在叙述上缺乏兼收并蓄各种艺术流派尤其是现代主义的形式技巧的气魄,进而使其在若干年内的办刊风格保持比较固定的模式,而缺少开放的、多元共存的气度,多少显得有些保守、闭塞与中庸。

三、评价:《清明》与新时期安徽文学评论

《清明》自创刊起,格外重视文学评论。从1979年的创刊号至90年代中期,《清明》的栏目设置上固定设有“评论”,每期大约占有两万字左右。1995年第1期起更名为“清明论坛”,同时刊量也有所增加。“清明论坛”成为《清明》固有的品牌栏目,延续至今。这块阵地的坚守使得新时期安徽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能够同步并进,积极参加其中的安徽评论家有苏中、张禹、沈敏特、段儒东、唐先田、钱念孙、王宗法、王达敏、赵凯,等等。他们一方面敏锐地关注全国文坛重大理论争辩并积极参与,另一方面对安徽作家的创作成果进行建设性的研讨和评论,热情地支持安徽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石楠《张玉良传》(1982年第4期)和《巾幗传奇——评〈张玉良传〉》(1983年第2期)、耿书成的中篇处女作《冷色调》(1987年第5期)和沈天鸿《冷色调的冷与热》(1988年第4期),熊尚志《水上女子芦苇花》(1990年第6期)以及黄书泉《一曲哀怨凄丽的歌——读〈水上女子芦苇花〉》(1990年第6期);十六岁少女黄雪燕《给我一片蔚蓝的天》(1991年第1期)和编辑涂路《文学是属于天才的——〈给我一片蔚蓝的天〉编后》(1991年第1期),这些评论文章的刊发,显示了《清明》给予本省作家的密切关注和有力提携。

《清明》的理论批评板块不仅在推介安徽文学作品上起到促进作用,还经常组织发文对安徽文学现状、安徽作家群、安徽文学形势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评析。最典型的例子是,新世纪之初的“清明论坛”(2000年第6期)推出一篇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略论九十年代的皖军》。此文中,严云受教授对新时期以来安徽作家作品做了高度概括,既肯定了其具有敏锐的现实主义精神

和开放的写实体系融合的艺术特征,同时提出,应该需要更深入地开掘题材,寻求意义的升华;在汲取新的艺术方式、手段上,更勇敢、更有创造性一些。这既是对过往安徽文学的回顾与总结,又对即将展开的新世纪安徽文学起到警醒的作用。2001年,安徽省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召开,第2期的“清明论坛”连续刊发老作家严阵的《我们为什么要写作——致安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许春樵《作家的精神准备与文学新价值观》以及郭传火的《固守文学的孤岛》,这些文章继续从不同侧面分析了青年作家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创作所面临的机遇、挑战和考验。它们的出现,对于安徽中青年作家而言无疑是极好的鞭策。

此外,《清明》积极打造平台,通过召开笔会、座谈会、研讨会等方式,将安徽作家、理论家们组织到一起,积极开展文学活动,努力推动文学创作的良性发展。比如1985年,《清明》编辑部和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共同先后召开了陈小初《空地》讨论会以及“熊尚志中篇小说讨论会”。两位均是当时本省的青年作家。在《清明》的邀请下,作家、批评家、编辑、文学研究者均参与其中,共同探讨作品的成就和不足,类似的举措很好地促进了安徽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安徽文学创作的发展。

要而言之,作为文学传播的重要载体,《清明》自创刊以来深度介入新时期安徽文学的发展进程。它秉持“贴近现实,推出新人”的办刊原则,向安徽文坛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文学新军;无论在任何时期,它都坚持固有的良好传统,以自己鲜明的追求和立场,导引了新时期安徽文学主潮;它充分利用自己的平台功能,集结安徽文学界的各方人士,共同探讨安徽文学发展的未来。到今天,《清明》已经走过了30多年历程,跟着时代的步伐,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明天,我们期待《清明》能够推出更多文学精品,更好地促进安徽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唐先田,杨四平.安徽文学史(第三卷现当代)[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204.
- [2] 潘军.《清明》和我[J].清明,2011(1):179-180.
- [3] 黄裳裳.探寻人的“生”的意义——皖北作家孙志保论[J].清明,2001(3):175-182.
- [4] 罗执廷.文学选刊与当代小说的发展[D].暨南大学,2008:47.
- [5] 《清明》编辑部.写在一九八零年春天[J].清明,1980(1):4-9.
- [6] 严云受.略论九十年代的“皖军”[J].清明,2000(6):185-190.
- [7] 黄发有.媒体制造[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13.
- [8] 段儒东.回顾《清明》风雨路[N].新安晚报,2014-12-23(C15).
- [9] 《清明》编辑部.卷首语[J].清明,1998(4):1.
- [10] 毛姗.重整皖军旗鼓振兴文艺批评[J].清明,2000(5):170-173.